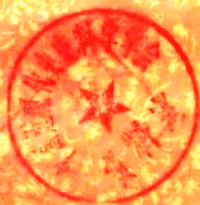


18.13

XIANGXI
WENSHI
ZILIAO

湘西文史资料



第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
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32

●主 编 张二牧
●副 主 编 杨伯熙
●责任编辑 傅冠群 谢心宁

目 录

· 历史人物 ·

- [1] 李烛尘先生与“永久黄”团体……………黄叔眉 刘德辉
[13] 武林女杰彭善思……………曾文洁 洪振翔
[28] 覃辅臣的一生……………覃正炎
[34] 抗日烈士陈士伯……………张玉林
[37] 不徇私情的汪之斌……………汪承栋
[40] 回忆先父向敏思……………向大一
[44] 苗乡举人龙廷鑑……………石琅斋
[47] 我的父亲田松溪……………田孝唐
[52] 龚德柏先生办报生涯……………张永安

· 革命回忆录 ·

- [72] 红二、六军团会师和湘西攻势……………陶汉章

· 历史事件 ·

- [80] 陈渠珍“围剿”红军侧记……………孙锡华 张章
[85] 跟随舒安卿打红军……………向飞鹏 田志勇
[89] “乾城事变”亲历记……………谢元龙

· 教育史话 ·

- [93] 国立八中简况……………吴振潮

- [99] “战教九团”在乾城……………吴生林 罗应贵
 [102]张毓灵办乡村小学……………张金煌 谭振群

• 怀念沈从文 •

- [105]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先生……………严超 马蹄声
 [109]从文先生二三事……………杨晓春

• 社会一隅 •

- [112]下溶乡任职记事……………刘济汉
 [119]“金坡脚”向田二人争乡长……………贯群 周兴文

• 民族史料 •

- [126]老司城今昔……………吴壮达

• 地方武装 •

- [137]凤凰县民国年间的地方武装……………凤政文
 [161]田伯卿武装始末……………彭景星 田廷清
 [166]瞿桂林拖队记……………廖子森 李家柏
 [27]沈从文在西南联大……………红 眉
 [36]解放初期的大庸市场物价……………龙德纯
 [43]陈渠珍的湘西“自治”……………彭俊 辑
 [71]苗族武术师石怀玉……………吴家清
 [92]张发奎谈陈牧农之死……………杨伯熙 辑
 [118]清代永绥的两所书院……………侯祖松等
 [160]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……………贯群 辑
 [169]熊希龄上当签命令 袁世凯解散国民党……………贯群 辑

李烛尘先生与“永久黄”团体

黄叔眉* 口述

刘德辉 整理

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九年，我在天津塘沽永利碱厂任职。这期间，李烛尘先生（永顺县毛坝人）任永利碱厂厂长。他为我国化工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为人处世的高尚品德，至今使人念念不忘。一九五八年，李老（时任轻工业部部长、全国人大常委）曾来湘西永顺县视察。当时，我下到首车区吴家寨划玻璃。我闻讯赶到城里，李老却已匆匆离去，未得会晤。一九六八年，李老不幸在北京逝世，使我思念李老之情与日俱增。

找 出 路

一九二七年，上海“四·一二”事变后，湖南接着发生了“马日事变”，割据永顺的向子云亦大肆“清党”，到处抓人罚款。黄其金是永顺党部的妇女委员，亦属在“清”之列，被迫到乡下躲了几个月。我当时只是与县党部的人有过交往，也被抓去关了几个月，受了一场冤枉气。在那是非颠倒、黑白混淆的年代，生命难保，出路何在？

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一九二八年春，为了求生存，找出路，我与黄其金、黄其瓚相约逃出永顺，投奔塘沽李烛尘先生。当时李烛尘先生当塘沽永利碱厂厂长，我们找到了他。一见面，他亲切地询问了我们各自的情况后，深情地说：

* 黄叔眉先生现年八十三岁，永顺县人。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九年，曾在李烛尘先生身边工作。

“你们从湘西来到天津不容易啊！我当年也是为了找出路走出湘西的。个人的出路，国家的出路，到底在哪里？正需要我们大家找哩！”接着他说：“我是抱着‘科学救国’、‘实业救国’的信念参加‘永久团体’工作的。这个团体主要是生产精盐、纯碱和硫酸。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是玻璃、造纸、纺织、染料、有机合成等许多化学工业品的基本原料，也是馒头等食品发酵的必需品，其重要与硫酸相当。酸碱的生产情况能反映整个国家的工业盛衰。我国以往所需纯碱大部分依赖英国卜内门碱业公司输入，大量黄金、白银外流，吃了不少的亏。现在我们自己生产纯碱，走自己的路。不过这条路上障碍还很多，还不知道走得通走不通。但我们有信心走下去。”谈话中，他似乎发觉我们既兴奋又焦急的心情，便转过话题，安定我们说，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管做什么，都要准备吃苦。”听了他的一席话，我们茅塞顿开，觉得他既是慈爱的家长，又是严格的老师。

一个星期后，黄其金被安置在永利碱厂子弟学校（即明星小学）教书。因为她是桃源女子师范毕业的。黄其瓚年轻些，被介绍到天津扶轮中学读书。我读过几年私塾，无专业知识，年龄又已二十出头，不宜入学读书，真难为了烛尘先生。一个月后，他让我到永利碱厂经管部管理处上班，并招呼老职员帮助我熟悉管理业务。

勤 俭 家 风

我与烛尘先生有乡亲情谊，又与他的长子李文采同年，我在厂里便称他“厂长”，在家里就称他“伯伯”，称他的夫人为“伯娘”。郁夫人也是永顺毛坝人，朴素贤惠，勤俭厚道，没有文化，是位典型的湘西农村妇女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烛尘先生是留学归来的化工专家，却与一位目不识丁

的农村妇女相处得如此融洽。她深深懂得烛尘先生是一厂长，肩上的担子很重，她把家务事诸如煮饭、洗衣、缝补，全部担当起来，使烛尘先生无后顾之忧。烛尘先生深为她这种精神所感动，也就特别钟爱她。他曾对我说：“我能安心在厂里工作，有你伯娘一份功劳，她不把家务事担当起来，我哪能一心扑在厂里！”郁夫人也常对我说：“厂里上千人穿衣吃饭都要你伯伯管，我不把家务事做好，就要误了他的大事。”虽然厂里给他家里安排有一个跑腿的小伙子，但家务事他是不会做的。

一次，烛尘先生请我和周自求、刘克勤三个湖南人吃便餐，一张小桌子，几把小椅子，四菜一汤，喝的是烟台张裕酒厂生产的白兰地。烛尘先生给我们每人酌了一杯，说：“尝尝烟台名酒！”我一品尝，味道醇厚，果然好喝！在座的我最年轻，又喜欢喝酒，就伸手到烛尘先生面前取酒瓶，不料他却把酒瓶从桌上移到桌下，说：“这个让我掌握，你们不能掌握。酒这东西喝点可以，喝多了就伤身体，误事情。这个尺度年轻人不易掌握。”郁夫人补了一句：“厂长是怕你们喝醉了。”

席间，烛尘先生风趣地向我们提出了个问题：“我们厂里有个著名的‘寡妇’，你们认识吗？”我们说：“不认识。”烛尘先生豪情满怀地对我们说：“这位‘寡妇’就在我们中间，是福建闽侯的侯德榜。”我吃惊地脱口而出：“他是男的呀，是我们的总工程师！”周自求大概鄙笑我的话太幼稚，不禁大笑起来，“噗哧”一声，满口饭菜喷了一地。烛尘先生于是接过话头，为“寡妇”作注释：“‘寡妇’这个称号是范旭东总经理给侯德榜赠送的。侯在化工方面有真才实学，在美国也是第一流的人才。可是这人奇怪，自从知道范旭东在中国办化工事业以后，他就决心抛弃美国的高工资、高享受，心甘情愿回国和我们一起受苦——办化工事业。

回国后，又有几个大单位以比我们厂里高出双倍的工薪拉他，他也无动于衷。他哪里也不去，一辈子都愿守在‘永久团体’这个大家庭里。‘寡妇’这个称号就是这样来的。”多么可敬可爱的“寡妇”！我听了从心里敬佩侯总工程师。

这以后，郁夫人最喜欢我到她家里用家乡口音和她叙乡情（外地人讲话她听不懂），只要隔上三五天，她就捎话要我到他家里去。

一九三一年的一天，我“奉命”到她家里参加分家会议。原来，烛尘先生膝下有三个儿子：长子文采，次子文奎，三子文明都已长大成人，文采先生刚从上海交大毕业，又将赴德国留学，尚未结婚，文奎、文明二位则都已结婚，媳妇都是永顺乡里妹子。烛尘先生首先说：“你们都已长大成人，该独立生活了。你们的祖父在永顺毛坝开伙铺购置的产业，有稻田百把担，木房一栋，还有桐茶山几亩，杉树林一块，你们就分了吧。我在北方的一切属于‘永久团体’，我私人是一无所有的。”烛尘先生的话音刚落，文采首先表示：“我不是农民，不需要田土，我不在永顺住，也不需要家乡的房屋。”老二、老三则默不作声。但两个媳妇却非常关心此事，要求：“做父母的一碗水要端平，田土好差要搭配均匀，不要轻一个重一个。”烛尘先生听了两个媳妇的发言，笑了笑说：“你们的年龄不同，职业不同，文化水平不同，对事物的见解当然不一样。还是文采讲得好，符合孙中山先生‘耕者有其田’的主张……”不过，郁夫人还是认为两个媳妇讲得好，祖业不可不要。我在同意郁夫人意见的基础上，也讲了几句：“继承祖业，三弟兄都有份，现在老大不要，老二、老三两股平分，合情合理合法。不过日后做大哥的不要反悔。”于是，把田产、房屋、山林作两股分给老二和老三。接着吃晚饭，烛尘先生讲了一段他年轻时在常德西塾师范读书时的情况，他说：“从永顺到常德有六百多里路，山高

水险，全凭一根扁担，一双草鞋。寒暑假回家，一天步行八十、一百里，途中就要花上七八天，不过也好，吃过那样的苦，现在什么苦也不怕了。”他还讲了些在日本留学时勤工俭学的情况。分家会后，我心里细细琢磨，烛尘先生的每一句话都有意思，耐人寻味。

一九三四年，郁夫人不幸因病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。烛尘先生失去了贤德的内助，心情十分沉重。许多人主张他大办丧事，他都婉言拒绝了。只买了棺材和包扎遗体的丝棉，当天晚上烛尘先生对守灵的亲人讲述了郁夫人一生勤俭持家的事迹，还宣读了他自己撰写的祭文，第二天就安葬在北京西山。

郁夫人逝世后，烛尘先生非常怀念她一生勤俭持家的美德，自己坚持吃斋一年。

一年后，儿媳都眼看父亲工作繁重，生活清苦，心里很是不安，都要爸爸为儿媳们找个妈妈。儿媳们的意见一提出来，自动上门充当“红娘”的人络绎不绝。不少人的意见是：找一个志同道合、名位相当的对象，如教师、教授、医生、经理、工程师、会计师等等，个别人的意见是：烛尘先生是位著名实业家，有条件找一位年轻貌美的女郎。以上意见，都被拒绝了。只有老二文奎巧生一计：自己的姨妈郁后花是妈妈的胞妹，三十五岁了，是位抱独身打算的闺秀。她和妈妈一样，勤俭贤淑，但无文化。文奎的这个设想得到兄弟和嫂子们一致同意，但都不好意思跟父亲说。于是，让我把这个意见转达给烛尘先生。他勉强同意了，他说：“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和睦，为了我的事业，就照他们的意见办吧。”在征得郁后花女士的同意后，文奎千里迢迢回到永顺县毛坝，把姨妈郁后花接到了天津。不久，烛尘先生与郁后花女士在国民饭店举行了婚礼。郁后花跟姐姐一样，热心承担家务，关心儿子媳妇，亲如生母。烛尘先生的家庭生活同往日

一样，全家人团结和睦，他自己依然一心扑在祖国的化工事业上。

为“永久”呕心沥血

烛尘先生生活简朴，态度和蔼，老成持重，没有官气。他住在新村二十五号（新村共有七十六号，都是工厂的宿舍），距碱厂约两华里。因工作需要，总公司要为他买一辆小汽车，他坚决不要，最后勉强同意配备一辆人力车——典型的天津式黄包车，上有撮瓢形顶蓬，座前有车帘，经常停放在厂门口。但他上班下班以步行为多。一九二九年夏天，某管工因态度恶劣，打骂工人，引起公愤，发生罢工。这是我到永利碱厂十多年仅有一次罢工。一天，数百工人把那管工重重包围起来，要痛打他一顿出出气。那管工事急计生，他看见厂门口那辆黄包车，趁人不注意钻了进去，放下车帘，向新村快速驶去。工人见了以为是李厂长回家，谁也没有过问。那管工竟安然逃出了重围，躲脱了一次惩罚。

这次事件发生，引起烛尘先生深思，他采取一系列措施，教育管理人员，改善工人福利事业，诸如办工人食堂、医院、子弟小学、工读班等等，他都亲自兼管。并亲自给工读班讲课。现在我还记得烛尘先生给我们讲过三次课，一次是讲食物的营养价值。他详细地分析了各种食物的维生素，特别强调蔬菜的营养价值。他说了多吃蔬菜、少吃肉食的好处。又一次是讲永利碱厂与英国卜内门碱业公司斗争的经过。他说：“永利出纯碱之前，外国人嘲笑我们说‘永利想出纯碱，除非日头从西方出’。我们憋着一肚子气，埋头苦干了四五年，终于生产出了红三角牌纯碱，平均日产量从一九二六年的十二吨，到一九三五年日产量达到一百二十吨。我们生产出纯碱以后，卜内门又多次以降价方式打击我们。总经理范旭东先生带领大家不屈不挠、针锋相对地与之斗争，直

到胜利。”另一次是，他带领我们走进铁工车间，指着一台旧机器提问：“谁知道这台机器的来历？”我们面面相觑，谁都讲不清楚。烛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这台机器来之不易呀！建厂初期，需要从国外引进这样一台机器，即刨光直径二至三米，重一至二吨的工作母机。范旭东总经理派陈调甫到美国去买，美国这种机器价格很贵，陈调甫舍不得买，也买不起，于是他到处去打听。一天，他在纽约街上看到一张拍卖旧机器的广告，价格很低廉，仅相当新机器价格的二十分之一。但他又怕不适用，不敢马上成交。随后，他找到我国的旅美人士和留美学生，央求他们帮助鉴定那台旧机器是否适用。其中找到一位重要人物，就是福建的侯德榜先生。经过侯先生等人精心鉴定，认为那台机器价廉适用。于是，才决定买了下来。你们看这台机器不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吗？”最后，他概括地说：“我们就是本着节约原则，精打细算，一个钱当两个钱用，才把这个厂子建设起来的。”

厂办明星小学、工读班，都一律不收学费。我本来只读五年私塾，文化水平低，很难在一个新型工厂里立足。我知难而进，上了工读班，由于持之以恒，我不仅学得了许多科学知识，而且学会了常用英语和日语。我的点滴成就都与烛尘先生的关怀和鼓励分不开。

烛尘先生喜欢打网球，网球场在久大盐厂和永利碱厂之间。他下班回家经过网球场时，往往停一停与职工们打一会儿网球。我最喜欢同烛尘先生打网球，我打网球就是那时学会的。他还喜欢滑冰，我也常常同他一道去滑冰。一次，他带着小外孙向初旦（现在北京大学任教）去滑冰，是我教向初旦学会滑冰的。

厂里每到年终便发放奖金，每人四十至六十元。烛尘先生常常亲自将奖金送到职工家里。一天，大雪纷飞，他冒着风雪到职工宿舍送奖金，他说：“今年奖金不多，对不起！”

大家买点过年的烟酒吧！”有个老工人说：“今年买了新机器，修了新房子，奖金少点我们心里也乐意。”

工人食堂一向办得很不错。听老工人说：一次，黎元洪来厂参观，称赞食堂办得好，说工人吃的馒头很白，同他吃的差不多。

又一次，我们几个管理人员伴随烛尘先生为全厂年龄最大的、住在“黄海”头门口的退休老工人（名字记不得了）祝寿，搞得很隆重。我们带着寿饼、寿酒、寿匾、养老金，一路敲锣打鼓，放着鞭炮。那些老工人都高兴地说：“李厂长辛苦了！李厂长辛苦了！”

有个星期日，我随烛尘先生去海滩散步。海风拂面，烛尘先生心情格外舒畅。他指着起伏不平、泥沙封盖的盐堆说：

“这就是我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。用它制成精盐有利民众健康；用来制碱，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啊！”他面向一望无际的大海，问我：“我们的化学研究社为什么冠以‘黄海’二字？”我结结巴巴地讲不清楚。他激动地说：

“这是我们对黄海寄予的深情和希望！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无穷尽的资源啦！在提议筹建‘黄海化学研究社’之初，‘永久团体’的经济还十分困难，不少人说现汤喝不完，哪能办研究机构？范旭东先生高瞻远瞩，他毅然表示当掉裤子也要办黄海。”接着他又问：“我们的刊物为什么定名为《海王》旬刊？”我还是讲不清楚。他说：“我们的事业靠海起家，最初就是在塘沽用海水晒盐、煮盐，有时干脆叫‘煮海’。后来，以盐制碱，两担盐制一担碱，这都离不开大海呀！大海浩瀚无边，我们的事业，前途也是无限的！”他形象地说：“黄海是‘永久’两厂的大脑，《海王》是‘永久黄’的喉舌。”他还告诉我：“《海王》发刊词是范旭东总经理亲自写的，不仅把办刊的宗旨阐述得清楚透彻，而且很有感情。”并叫我回去好好读一读。

烛尘先生最敬佩两个人：范旭东和侯德榜。他曾对我说，“范旭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是我国化工事业的奠基人。是我在日本时的同学，比我小一岁，可是在许多方面他是我的兄长和老师。他有坚韧不拔、百折不挠的精神，全靠他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‘实业救国’的路，他慷慨无私，将他创办‘永久’的一笔酬金，全部捐献出来办‘黄海’；他为了争取我参加董事会，慷慨赠股五千元，使我获得了当选董事的资格。”烛尘先生特别佩服范旭东的爱国精神。他说：“芦沟桥事变前夕，日本人频繁来我公司，勾引‘永久黄团体’与之合作。一次，一个日本友人来访，我也在座，相谈甚欢。但是当那个日本友人提到什么‘东亚共荣’、‘中日经济提携’时，范旭东站起来义正词严地斥责道：“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快滚出去！宾主不欢而散。”

烛尘先生最佩服的另一个人，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位“寡妇”，“永久黄团体”的总工程师。他说：“侯德榜设计创办永利碱厂出了名，出了书（用英文写成的《制碱工业》），印度、巴西等国办碱厂，都争相聘请他设计，当顾问。他将所得报酬金全部捐给‘永久黄团体’。”他还说：“有好几年过年那天，侯德榜约我到厂里值班，让工人回家去团聚。”所以我在结婚的前几年，每到烛尘先生家去过年，总是不见他在家，其原因就在此。

烛尘先生还赏识一位帮助永利建厂的美国专家李佐华先生。这位专家擅长设计建造各种类型的“石灰窑”，他为永利设计建造的大型石灰窑能自动旋转出灰，大大提高了工效，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。烛尘先生曾告诉我说：“一九二五年永利最初生产的碱，略带红色，不能与卜内门的‘洋碱’相竞争。李佐华仔细观察，发现碱之所以带红色，是因为机器受氨气和碳酸气的侵蚀，形成铁锈，铁锈污染了白碱。他建议加入少量硫化钠，使它同铁器接触，在铁器表面涂抹一

层薄膜，这种薄膜既能防止铁器少生锈，又能防止铁锈污染纯碱。由于照他的意见办，这以后出的纯碱果然洁白如雪，其质量达世界先进水平，永利碱厂从而取得了世界碱业工会会员资格。

永裕盐厂是永利碱厂的兄弟厂。该厂有个老秘书名叫文永言，爱写文言文。《海王》旬刊登出过他的一幅对联的上联，向读者征求下联。上联是：“文永言，字公信，在永裕盐厂，专写文言公信”，我和周自求对出了下联：“美国李，名佐华，来华北碱厂，特怀美意佐华”。结果我们获了奖。可见李佐华帮助我厂作了贡献，很有影响。

烛尘先生爱才如命，求贤若渴；又善于育才，善于用才。我觉得每与他谈一次话，就象听了一堂生动的课，自己仿佛聪明了。“永久黄团体”无论经济有什么困难：所办小学、文化补习班和技术补习班，从来没有停过。不仅如此，每年还要选举一两个人到外国进修，这要花费一大笔钱。他曾多次到京津各大学工学院求贤，聘请品学兼优、学化工专业的毕业生来厂当技术员。这些大学生稍加锻炼，都成为车间技术骨干。“七·七”事变发生后，他与范旭东等人决定内迁，拒绝与日本“合作”，他被选为内迁总负责人。他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三百多名技术人员。他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将他们转移到武汉、长沙，然后陆续进入四川，把他们安置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，使他们各得其所，各尽其才，为大后方制盐工业服务。他坚信“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”，常说：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

烛尘先生善于倾听意见。一九三三年，范旭东、李烛尘等决定办硫酸铔厂，但厂址选在哪里？开办这个厂的意义未为职工所尽知。他深入车间开小型座谈会讨论。他说：“碱和酸好比人的两条腿，有碱无酸，有酸无碱，这个人就是跛子，走路走不快，所以我们决定办铔厂。这对于农业、国防

工业都至关重要。厂址设在哪里？请大家出主意。”大家各抒己见，讨论可热闹哩！可是他不作结论，只是当场批驳了把厂址设在租界的意见。他说：“把工厂设在租界，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，如果打起来，租界岂能保险？”散会前，他给每人发手板一张纸，要我们深思熟虑，写个建厂地点，并说明理由。硫酸铔厂建在江苏省六合县卸甲甸，就是这样选定的。

烛尘先生为人厚道，寓精明于深厚之中。三十年代初，英国卜内门碱业公司不甘心我们打破了他们在我国的垄断地位，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。一日，该公司职员王某（中国人），通过关系来我厂表示“友好”，愿意“合作”，实则充当间谍，刺探我厂经济情报。永利营业部部长余啸秋将这一情况转告范旭东、李烛尘，他们将计就计，对王某晓以国人“实业救国”之大义，争取他觉悟、同情，并许以固定补贴，为我所用。结果，卜内门长期所得“情报”，恰是我方需要卜内门所知道的情况。

一九三五年以后，我任永利碱厂唐山办事处主任。一天，我乘火车往塘沽本厂结帐，随身携带公款三千元和一批报表单据。当时已临近“七·七”事变，军队调动频繁，时局日趋紧张。因为所乘客车要让军车，耽误了八个多小时，车抵塘沽已是凌晨一点了。我一下火车，走进巷道，面前突然出现三个流氓，开口向我借一千元。我人单力弱，不敢与之硬拼，苦口哀求，给了他们每人一百元，才得脱身。这三百元损失，差不多等于我半年的薪金，怎能赔得起！不得已将实情报告厂长。烛尘先生认为这一意外事故，非我个人力量所能抗拒，当即签字准予报销。他这一判断，使我感激得流下了眼泪。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，“永久黄团体”全部被日本侵略者霸占。我与七个年轻的职工奉命留守厂房。日本人道根、小

守川等十余人进驻永利碱厂。我多次被喊去盘问，强令我们尽快恢复生产。我们共同守着“誓不助敌”的原则，暗中把三十支护厂驳壳枪全部投入深水塘中，并把厂内十七条管道堵死。日本人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巨大的机器而无法使它运转。

工厂被占以后，几乎每天都可看到日军驾驶的汽车装着中国人或送监狱或处死。我想，不知哪一天自己也会被装进汽车。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在老虎口里呆了一年多。到一九三九年春初，我不得不从天津乘英国轮船经香港、广州，逃回到阔别十二年的故乡永顺。

一九四〇年，烛尘先生曾从重庆写信给我，望我入川工作。我因家室拖累，又怕敌机轰炸，没有成行。抗战胜利后，“永久黄团体”陆续复员。一九四七年，烛尘先生任“永久黄团体”总经理。他又来信说，“永久黄团体”凡因抗战迁厂、流散的人员，愿意回原单位的均可优先安置。此时，我又因自己经营的“兄弟商店”无人接手，也未能成行。

烛尘先生古诗文根底很深。范旭东说他是“永久黄团体”的秀才，还是一个“洋秀才”。因为他的确是清末秀才，民国初年又留学日本，著有《行吟集》。

我与烛尘先生之相处，距今整整半个世纪了。他已辞世二十一年，我已年届八十三岁，眼花耳聋，许多往事已付诸流水，唯独与烛尘先生相处的往事，记忆犹新。今能按我口述撰成此文，了却晚年心愿，幸甚！幸甚！

【责任编辑 杨伯熙】

武林女杰彭善思

曾文洁 洪振瑚

我们乘西去的列车，到了四川省内江市。内江有一条沱江，城市绕江而立，故称内江。彭善思老人在这条秀丽的江边生活了整整三十二年。但，她思乡的情绪，仍象这源远流长的江水，撕不断、流不尽。

老人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，双眼仍然发亮。她刚刚退休。她的功夫很深，出掌一股风，踢腿过头顶，弯腰能触地。

老人十分想念自己的家乡，送我们回归时，她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说：“很想回家乡看看去！”

苦难的童年

彭善思，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九日傍晚诞生在永顺县王村的土家族山寨。她的父亲彭皮四、母亲张金菊境遇凄苦，家里只有两丘稻田，两块小园子，拼死拼活地做工夫，四个子女又小，连野菜也难吃饱。几年过去了，张金菊流着眼泪对不懂事的女儿彭善思说：“儿呀，你长大了，别跟娘一样落在这穷地方呀。”在房族侄子中，彭善思排行第六，故小名叫“老六”。按自家兄妹排，她是老二，上头的是哥哥。善思七八岁就帮爹妈干活，还帮妈妈把饭菜分给弟妹们。一次，她端着一碗热汤，弟妹们拥上来抢，她把汤碗举过头顶，不意被弟妹抢泼，浇到颈上，至今还留着那烫伤的疤痕。小善思屋里屋外的事都要做，背着弟弟放牛要扯猪草、扯野葱，